

# 美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朱晓军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实践美学对主体性的强调,是美学研究的 一大理论收获,也在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是,主体论哲学背后理性独断论的理论误区,使实践美学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局限。后实践美学关注主体间性在审美活动中的本体地位,既为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又沟通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从而拓展了美学理论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美学; 范式; 主体性; 主体间性; 转换

**〔中图分类号〕**B83-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909( 2005) 07- 0114- 03

实践美学作为上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美学流派,萌芽于 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成熟于 80年代的“美学热”,至 90年代中期,实践美学不断受到质疑与挑战,至今余波未平。对于实践美学的驳难来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其中以生命美学和以存在论为基石的后实践美学攻势最为猛烈。透过这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的论争,我们可以断言,目前中国的美学研究正经历一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这场转换将为新世纪的美学研究开辟一片新的广阔空间。

众所周知,在人文学科诸门类中,美学与哲学的关系是最为紧密的。美学理论的拓展,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支撑;而哲学思潮的变迁,将直接导致美学理论的沿革。具体到现代中国的美学研究而言,唯意志论的叔本华之于王国维,新黑格尔主义的克罗齐之于朱光潜,其学理脉络,清晰可辨。实践美学虽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为本,但细究起来,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才是根本中之根本。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头之一,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而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整个启蒙哲学,虽然各家歧见纷呈、别有所会心,但从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是一源众流。这一源就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沉思,首先把哲学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既不是古代客体性哲学中等同于水火等元素或消泯于“理念”中的“物”;也不是宗教神学中仅仅反映神性之光的卑微的“灵魂”,“我”通过自我意识(我思),既与自然相

对,也与上帝相对。“我思”就是人的觉醒,由此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康德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回答——“敢于运用你的理智”。自笛卡尔始,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就深刻影响了此后几个世纪的哲学思维,主体的优先地位因此得以牢牢树立。作为一代哲学宗师,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分别探究了人的知、情、意三大精神领域,开拓了哲学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研究的新境界,从整体上奠定了人的主体地位。从总体上讲,无论是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还是谢林的“绝对自我”的扩张;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还是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在肯定主体的优势地位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中国的实践美学在当时之所以魅力无穷、引人注目,并非由于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阐发,而恰恰是因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与康德主体性美学进行了巧妙嫁接,从而在饱受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蹂躏的万马齐喑的后文革中国社会,率先高扬主体性,竖起了“人”的大旗,从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于实践美学在促进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文学艺术的创新和美学文艺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功绩,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是不为过的。但是,随着现代哲学对现代性(主体性)的反思和清算逐步走向深入,由主体性的张扬而导致的理性的自负、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独断论等弊端日益彰显,像萨特“他人就是你的地狱”暴露了主体性哲学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面临

的可怕的疏离与紧张;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全面危机等。实践美学在弥合主客二元关系上,尽管找到了“实践”这一中介,并以此来阐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力图在“合目的性”(主)与“合规律性”(客)的双向互动中建立平衡,探求主体通过实践并在实践中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而实现审美超越的奥秘,但这样的逻辑推演,其实仍未脱离理性主义的窠臼——主体基本上被化约为“认识主体”,自然作为主体的对象,仍然是次一等的有待揭示与征服的对象,审美活动还是被有意无意地归结为认识活动。同时,人的意志、情感等精神活动被笼统地归入“人的本质力量”里而语焉不详,与人的审美体验息息相关的身体、本能、直觉、无意识等等则基本上被忽略了。实践美学的局限,除了哲学基础上的“主体性”偏见之外,按张法教授的说法,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即“什么不是实践”的问题。不能清晰地界定“实践”的边界,用实践来界定美的本质(姑且不论美是否有“本质”)只能是冒险的。

实践美学赖以建立的西方主体性启蒙哲学,自20世纪以降受到了来自不同哲学流派共同批判和挑战,尤其是笛卡尔的主客二元观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以理性主义和主体性为标志的现代性,甚至被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鲍曼直截了当地与奥斯威辛联系起来,他的一本专著标题就叫做《现代性与大屠杀》。实际上,在后现代主义起来颠覆现代性之前,已经有许多哲学家为避开现代性的陷阱而另辟蹊径了。20世纪初,胡塞尔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谈及自我和别人的关系,胡塞尔说:“在把他们作为人来经验时,我把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理解做和承认做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自我主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从这个位置上去看身边的事物,而且每个人将因此而看到不同的事物显相。……尽管如此,我们与我们的邻人相互理解并共同假定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时空现实,一个我们本身也属于其中的、事实上存在着的周围世界。”<sup>[1]</sup>(P125)这段话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直接论述了主体间性,并把主体间性作为哲学本体论来论证先验的“客观”世界何以可能,而且,这又涉及到后来成为热门话题的另一个哲学范畴——“生活世界”。也正是这里揭诸的思想,启发了海德格尔“此在在世”并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哲思。由此,困扰哲学史数千年的客观性问题得以在交互主体性,也即主体间的交往、对话、理解、共识中得以解决。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

理论影响下,伽达默尔开创了“视域融合”的解释学美学,哈贝马斯构建了交往行动理论,在他那里,理性不再是具有独断色彩的主体性理性,而是通过交谈和沟通而形成的交往理性。除了德国哲学之外,法国著名批评家巴特的文本理论、俄罗斯传奇思想家巴赫金的对话学说等,一同构成了主体间性美学的大合唱。在这个大合唱的背后,即是人类文化发展到20世纪以来的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现实和全球化的大趋势。

## 二

具体到美学研究而言,后实践美学与实践美学秉承的不同哲学思想导致了他们在美学基本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上不可调和的分歧。由现代哲学丰富的理论资源装备起来的后实践美学,毫无疑问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尽管思想不能以古今论短长,但每一个时代都会面临自己特殊的问题,再古老的智慧也不可能提供所有破解的法门。对此杨春时教授谈道:“主体性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把存在确定为人对世界的创造、征服,主体成为存在的根据。而主体间性哲学则消除了二元对立,把存在确定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交往、融合。主体间性哲学揭示了本真的存在,即不是人的自我膨胀和对世界的征服,而是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才能获得自由。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只有把他人当做与自己一样的主体而不是当做异己的客体和利用对象,才能通过交往、对话、理解、沟通建立自由、和谐的人际关系。”<sup>[2]</sup>所以,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批评,实际上标志着美学研究领域哲学基础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人的观点,新范式得以确立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新范式能包容旧范式,也就是说新范式可以解释旧范式所能解释的现象;2.新范式替代旧范式,新范式能解释旧范式所不能解释的现象;3.新范式的核心论点是不可证伪的<sup>[3]</sup>(P174-175)。当然,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自然科学的模式,但是,在对审美活动的具体研究中,我们已经能够证明运用主体间性理论可以更贴近审美经验的实际。由于人不再被化约为理性主体,情感、直觉、本能、无意识、身体等被主体性美学压制和忽略,而在审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认识论的狭隘视野被突破了。而且,实践美学无法解决的所谓“美的本质”问题,也因为后实践美学主体间性理论的现象学方法,被作为一个假问题而揭穿。

曾几何时,“美的本质”问题被认为是美学研究不可逾越、天经地义的最根本、最重大的问题,从而引发了无休无止的纷争。由于美学与哲学一体两面的密切关系,有什么样的哲学,必有什么样的美学,所以对“美的本质”也即“美是什么”的追问就自然而然地转换为对“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纠缠上。所造成的后果,在中国特有的语境下,就是长期以来美学研究的非科学化、意识形态化。只要你进入这个领域,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要表明你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立场,对应的就是进步与反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裁决。美学研究一度被视为是思想战线斗争的前沿阵地,后来演化为无论哪家哪派都噤若寒蝉的理论禁地,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当时学界都把寻找所谓“美的本质”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有极大的关联,而现代中国的美学研究之所以低水平重复,走不出意识形态的藩篱,与此也不无关系。实际上,“美是什么”这个命题已经预设了一个先在的、实存的、本质的、名为“美”的东西,套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只要你接受它的质询,它就会把你建构到它的固有轨道上去了。实际上,抛开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猛烈攻击不论,对美是否具有“本质”、即能否给美下个定义的问题,在中外美学史上从未有过统一的看法。著名哲学家、美学家休谟“趣味无可争辩”的观点就是一个代表。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美学研究一度钻进了死胡同。实践美学试图解开这个死结,反倒因为被套牢而暴露了自己的理论缺陷。后实践美学认为,美既不是像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的“客观”实体,也不是主体头脑中无中生有的瞬间感应,而是“此在在世”的意向性与现象的遇合。没有美,只有审美。就像美是一种变化无穷、不可方物的现象一样,审美是一个随现象世界一同流变不居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后实践美学可以与现在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接轨并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主体间性理论把自然也看成是可以与人类交流、对话、沟通的主体,而不是一个等待人类去开发征服的对象。从生态美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主体性的膨胀、理性的自负,自然与人是矛盾的、对立的关系,是人竭力开发、征服的对象,理性的骄子——科学是万能的,它将使自然俯首称臣,也将成为人的拯救者和解放者。众所周知,自启蒙运动以

来,迷信理性的作用,崇拜科学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依然坚信科学终将打开自然所有的奥秘,但像格里芬这样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已经开始呼吁人类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清醒地认识理性的局限和自然界的不可穷尽、不可全知性,倡导一种返魅的科学。后实践美学主体间性理论把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精辟论述和海德格尔人与大地互相“敞开”、“人,诗意地栖居”的见解沟通融合起来,为生态美学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新的哲学基础。

以此为桥梁,主体间性理论又连接上了推崇民胞物与和天人合一思想的中国古代美学,为解决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现代转化开辟了一条通道。正如许多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中有大量的自然与人互相平等、相互依存的思想。这不仅体现在思想家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中,体现在民间“老天爷”的人格化称谓中,更体现在中国悠久的诗歌和文学传统中。这类例子可谓俯首皆是随手拈来:李白的“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刘克庄的“万象为宾客”;姜夔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以及苏轼的“侣鱼虾而友麋鹿”等等。在此视域中,古典文学研究感喟不已的中国古典文论在西方强势美学、文艺理论面前的缺席和失语的问题,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阐释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适用性与有效性问题,中外学者的接轨与对话问题等,不能说通过后实践美学都可以迎刃而解,起码开辟了可能解决的现实途径。

#### 参考文献:

- [1][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杨春时.论生态美学的主体间性[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
- [3][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朱晓军(1968—),男,陕西汉中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文艺学、文艺传播学。

责任编辑:王敏